

非典型摩登城市系列

城市发展进行时

——上海城市节点案例集

Develop-PING

杨之懿 孙 哲 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非典型摩登城市系列

城市发展进行时

——上海城市节点案例集

Develop-PING

杨之懿 孙 哲 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发展进行时: 上海城市节点案例集/杨之懿,
孙哲编著.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0.7
(非典型摩登城市系列/杨之懿主编)

ISBN 978-7-5608-4325-4

I. ①城… II. ①杨… ②孙… III. ①城市建设-研
究-上海市 IV. ①F29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2411号

非典型摩登城市系列

城市发展进行时——上海城市节点案例集

杨之懿 孙 哲 编著

责任编辑 宋磊 责任校对 杨江淮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四平路1239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x 1092mm 1/16

印 张 16

印 数 1-2 100

字 数 315 000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325-4

定 价 5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直认为建筑师研究城市和医生研究人体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因为二者的着眼点都是一个限定的有机体，而且似乎从来也不可能可以完全理解各自的奥妙。

在大学里学习建筑主要是研究其设计方法，从功能、基地出发，到体量、平面的设计。但当面向纷乱的现实世界时，常常发现，大学里学习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利用率却很低，这种现状几乎让建筑学人失去对研究的勇气和信心。当然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学院派建筑设计手法在现实社会中并不那么受欢迎，也得不到重视。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研究真的只能利用我们的加班时间吗？我理解，研究如果不涉及其学术意味，那么本质上只是一种对待事情的方法，或者说是一个把系统整理透彻的手段。也许只有通过这一方法或手段，建筑师的设计实践才有可能比较容易得以实施。

本书所作的尝试是以上海的重要城市节点为研究对象，解读其空间生成的轨迹及其背后机制，正如书中指出的“旨在建立空间发展现状的索引”。当然，结论的困难总是意料之中的，“任何关于当代……城市的研究不可能得出真正意义上的结论。因为对象本身还不具备结论的条件”。上海目前的人口大概在1800万，拥挤喧嚣的这片土地，正企图满足1800万个不同需要。我们如何去完整地理解它的构成并如何幻想它的将来？

其实，一直对城市规划这门学科的态度有些半信半疑。一方面，可以确信城市如果不经设计必然会出现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至少有碍日常运行。另一方面，很难想象“一个”城市方案如何可以完全解决上千万人的不同需求。所以城市的规划设计是不是应该作为某个地方定下的引子来理解，而后续的“方案”要等置身其中的居民去各自填充。也许，好的城市就是不停地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发展。这么说来，本书也可以看成是上海在“发展中”或调整中的一个城市记录吧！

冯国安(香港)

建筑师、建筑策展人

前言

Develo-PING 1:

对上海这样正处于发展中状态的城市作研究真的非常困难。一方面它的变化速度常常让人不知所措。前两天还在讨论“亚洲第一弯”（延安东路高架外滩下匝道）与外滩道路交通以及城市景观的关系，明天它就要被拆除了，外滩地区将进入新一轮的调整规划，而这次更新距离上次不到十年。我们常常疑惑针对“当下”城市状况的研究和思考是不是真的具有操作性价值。另一方面，上海的很多城市状态无法根据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学来认识和讨论，很多表面现象无法用作有效的研究头绪，同时建筑与城市理论的发展往往赶不上城市的“日新月异”，在这种情况下，更深入的理论尝试和探索就显得有些像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这种“高速变化和无序”的developing状态正是所有中国当代城市研究不得不直面的现状，标题中的大写“PING”正是为了突出城市发展和理论研究背景的基本现实——研究对象与知识基础双重“进行时”对于我们实际操作时的冲击和影响。

Develo-PING 2:

这本书的内容只是我们系列城市研究的一部分。因为没有核心论点和最终答案，本书只能被看作一个研究集丛。“集丛”的效果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我们认为，这种开放性是有价值的。关于当代城市的建筑学研究，很多都过于强调情景式的图像判断，或者用于具体设计实践的形式语言。这些流行的研究方式往往忽视了对于研究对象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和现实价值，从而多少有点游戏似的自娱自乐。当然，目前建筑学这种各自为战又难以相互交流的局面可能也是建筑学本身不断市场化以及所谓设计个性至上原则的宿命。我们的想法是，除了急切地下判断做结论出形式，是不是还有可能以一种“纪录

片”似的工作方法，刻意保持与形式故事间的距离，还原研究和思考的朴素性。通过强调问题本身解答过程的弹性为线索，选择并推进方法以留下调整余地，从而为其他关联性研究和深入的讨论提供足够的开放性发展空间。

Develo-PING 3:

本书对十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节点进行调研分析，以“发展机制”为主要线索，试图理清这些城市中最为活跃的区域核心，在不同城市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调整需求下，谋求自我积累和更新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同时展现出的空间样态以及对于周边城市区域所产生的影响。深入客观地了解这些现状，是我们在思考中国城市在应对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全球化”和真正意义上“城市化”（并非城乡转化，而是城市功能本身的完善及多样化）时所提出的要求。更深一步地讨论中国城市在当代语境下其“现代化”过程区别于西方经典定义的特殊内涵，是我们研究工作最终的目的和使命。

武断地说，任何一项对于中国当代城市的研究都不可能得出真正意义上的结论，因为对象本身还不具备结论的条件。也许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处于发展中状态。但如福柯所言，正是“追问”使得现代性的本质与之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区别开来。

So, for develo-PING.

目录

序

前 言

解读城市“发展中”状态的上海	1
历史街区的现代商业化——外滩	15
“场所”、“枢纽”——人民广场	31
老城厢的现代化——豫园	53
成熟街区与高档商业——静安南京西路	67
居民区与大型公共建筑——虹口足球场	85
城市化与“中心”——徐家汇	99
城市“副中心”——五角场地区	123
从“项目”到“城市”——陆家嘴	143
商业与历史因素——淮海路新天地	169
大型城市交通枢纽与城市化——火车站“不夜城”	193

附 录

附录一 节点的图表化	216
附录二 大话城市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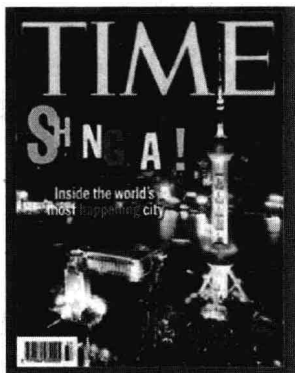
后 记	242
-----	-----

解读城市“发展中”状态的上海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快速建设发展，“城市化”是其中一个主要内容。上海是这一城市化浪潮中的代表性城市。我们坚持一种“将乌托邦深化下去，完美起来”的立场，对上海采取以重要节点为对象的研究方式，旨在建立“空间发展的现状索引”，并以此为基础思考中国城市形态的多样可能。

一、背景

1. 城市发展背景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快速建设发展，“城市化”是其中一个主要内容。上海是这一城市化浪潮中的代表性城市。我们试着从三方面对上海“城市化”现象的背景进行解读。第一，就中国社会本身而言，这次改革仍然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自身矛盾的要求。这种来自社会内部的要求进步、要求文明、要求走向世界的巨大冲动，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社会力量长期积蓄后的爆发。客观地说，这确实代表着中国历史的进步方向。而“城市化”，摆脱“乡村式的落后状态”，便是这一历史力量在物质层面的一种具体落实。第二，这次中国社会“现代化”恰逢晚期资本主义体制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急剧扩大的时期，国际性“城市网络”恰好是这次全球化浪潮的基本单位。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我们现有模式与国际现行各种体制的碰撞接轨。就上海而言，一方面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模式开始对上海进行渗透和控制，这种渗透和控制如此迅猛并无视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发展落差，给上海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上海必须主动地以全球化体制下各方面的“指标”来进行建设和自身衡量，这种“大跃进”式的发展方式也往往是以实际社会生活的巨大断裂为代价的。第三，目前中国现有的集权化的政治制度为“现代化”、“全球化”提供了政策方面的保障，官方政策主导性的发展模式促成了城市建设在速度上的“不可思议”和实际城市空间上较普遍的矛盾现象。可以说，在上述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海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再次处在一个快速的“发展中”状态，而且已经显示出了很多出乎意料的发展结果。这些结果正从根本上改变着上海城市的结构和内涵，而从理论的层面去准确地认识和理解这样的改变对城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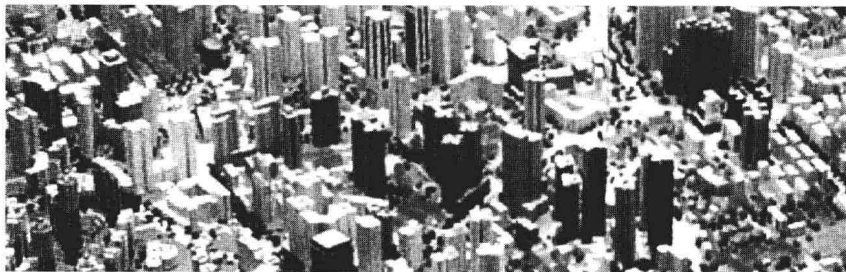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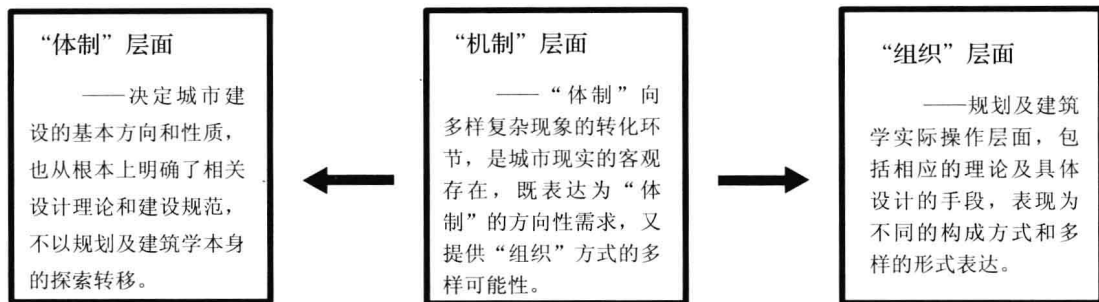
形成与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这就显得非常重要而紧迫。同时，这样的理论性研究结果对于同样背景下数量巨大的中国其他发展中的城市具有同样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上海城市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其内涵有着区别于西方世界，也区别于日本、印度这样的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特殊性。我们认为，直至目前仍然有着几个本质上是不同阶段的社会变革在中国同时发生的可能。横向比较，上海作为“认识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其复杂的现代化的历程不同于香港、东京、新加坡这样的东亚城市。纵向考查，上海在历史上有过很多不同性质的历史时期：农业海港城镇、租界半殖民地、“远东第一都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城市等等。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给上海留下了不同的烙印，使得上海的发展在本质上具有着复杂的层次。在今天这样各种后现代思潮深刻影响下的信息和消费时代，上海城市所具有的这种比较多元的不平衡的发展状况，这种多种语义相互拼贴、并置、重叠和杂糅的局面，在全球化挑战和自身膨胀的压力下将进一步表现出巨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其所蕴涵的意义和信息更将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特性。我们的工作就是试图直面这种特殊性，同时试将这种特殊性转化为一种典型性，以作为上海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现代化城市模式的证明。

2. 理论背景

首先，西方现有的理论对西方现代城市发展轨迹的认识已经非常全





面而深刻，这些理论是我们目前的重要参考。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上海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城市的基本现状。事实上，我们很难以一种“发展中”的不甚完整的城市生活状态去深刻理解对于那些已经成为结果的西方现代城市的描述和研究，对这些西方理论的接受和吸收不得不伴随着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而同时进行。这必然是一个吸收和反馈交错进行的持续性动态过程。

其次，“现代化”是一个从形而上的意识层面到具体的生活方式全面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必须从“总体性”的角度去认识的宏大命题。中国社会这次现代化的意义需要从全社会的各个角度来认识和解释，这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学术理论工作也是重大艰巨的任务。城市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从建筑学角度入手的观察研究，必定要参照其他相关学科和门类的发展。所以说，对上海城市研究的展开也必须融入目前大的社会理论发展潮流，这样才能找准研究自身的定位。

有几个我们比较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需要说明。

(1) “机制”问题 (Mechanism)

我们把目前影响国内城市建设和建筑行业发展的因素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来源于“体制”(Institution)层面，这里的体制不仅是指与国家政治体制相关的政策法规，也是指来自市场的基本需求和大众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惯。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建设的方向和性质，也从根本上明确了相关的城市设计理论和建设规范，所以从某种角度说，它不



以建筑学本身的探索为转移。这种因素可以被看作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另一类来源于“组织”(Organization)层面,这是城市设计及建筑学的实际操作层面,包括相应的理论及具体设计手段,表现为不同的城市结构构成方式和多样的建筑形态表达。作为传统上学科发展内容的核心,这也是目前国内行业内部探索的主要话题。以上两个层面之间就是“机制”(Mechanism)层面,是“体制”向多样复杂城市现象的转化环节,是城市现实的一种客观存在方式。它一方面表达为“体制”各阶段的方向性需求,另一方面又提供“组织”方式的多样可能性和操作“边界”。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定位。可以理解为主要针对的是“体制”与“组织”互相交织进而在具体城市空间中发挥相应作用的外化力量(Power),以及由此牵涉到的城市基本构成元素和形态特征。

如果大于机制的范围研究体制,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建筑师可能拥有的“权利”和操作范围。因为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建筑师不是作为具有独立话语权的精英知识阶层而主要是作为社会“建设者”出现的。这不仅是长久以来中国传统建筑方式的惯性,也是当下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中国建筑师在体制层面尚缺乏有效的决策能力,而机制层面也许是建筑师可以施展自身抱负的舞台。如果小于机制的范围仅仅推敲建筑学本身的逻辑和形式语言,又会忽略中国社会在特定阶段对建筑师所提出的要求。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状态,导致在建筑学科和行业内部都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很多问题属于中国特有的现象,在传统建筑学体系内部可能找不到准确合理的答案,但都急需得到清醒的认识和有效的疏理协调,这项任务目前看来只有基于建筑学背景的建筑师队伍才有能力去胜任。真正脱离理论对现实的认识和指导的“无人负责”的建筑行业运作模式是危险的,而这恰恰正是目前中国城市与建筑实践存在的最大隐患。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机制层面也是目前中国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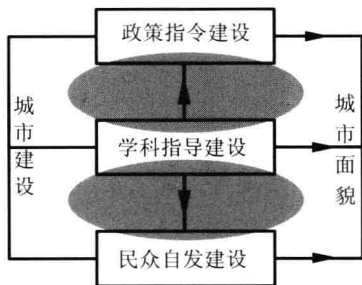
筑师必须坚守的阵地。

“Modernity without Rhetoric”——无修饰的现代化(Peter Smithson)可能在某种极端意义上说明了目前中国城市建设“表面上花样翻新，实质上仍是积累”的阶段性质，客观上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主要任务，也真正符合长效的中国市场尤其是内地城市的要求。而当下“代表中产阶级理想和要求的西方建筑学”思维(Arron Betsky)只对中国市场中的极少数社会需求负责。对“机制”问题的思考就是直接针对建筑师在中国现状中具体的操作范围和可能性而言的。所以，这样的方式与欧美在完成态的(Developed)社会状况和建筑学背景下展开的“当代”建筑学论述(Discourse)和讨论(Debate)是有区别的。

(2) “非正式”问题

城市的主要面貌通常由几个不同的建设内容组成，其中包括由政府政策指令主导的建设，规划和建筑学科指导下的建设，以及出自切身需求的民众自发性建设。基于欧洲的建筑学传统，西方的规划和建筑作为既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又区别于工程营造专项技能的特殊“知识”体系，一方面因为能够为政策提供较多的依据和研究，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官方政策对于城市建设的构想和决策；另一方面，也因为能够给予普通大众更为全面的支撑，所以也能对这种“自发性”建设行为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控制。就一个专业领域所应起到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能力而言，这样的方式应该说是相对成熟的。对于建筑学本身而言，可以暂时把基于这个操作系统上的城市实践看作较为“正统”或者说“正式”(Formal)的途径。

基于中国建筑营造的传统习惯，以及目前行业运行的“体制”特点，可能无法达成上述的模式。建筑学科还不能有效地为中国的政府及民众行为提供不是作为技术和技能而是思考和判断的依据和方法。更进一步来讲，也就无法真正有效地影响城市面貌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城市





面貌常常呈现出巨大的弹性与动荡。事实上，从19世纪末的近代化开始，中国城市建设就一直表现出这样的一种建筑学意义上的“非自明”的状态：各个阶段当时的建设者往往不清楚自己的工作在城市发展轨迹上的真实意义，有效的理论梳理工作总是极大地落后于被迫急速进行的各种实践。而且目前看来，在中国整个社会体系尚未完成原始积累，达到较为平衡和稳定的状态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的现实还将继续存在。非建筑师引导的建设实践不仅在过去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控制城市的主要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种“传统”。“非正式”的营造过程成为城市建设的“正式”传统。由于这样的城市传统呈现为一种区别于欧美城市的发展方式，在呈现出某种巨大的特殊性和必然性的同时，又不能被基于西方传统的城市与建筑理论知识所理解，至少是较为合理全面的认识，于是对现实的认识上，形成了巨大的理论真空。作为后果，城市建设与专业知识割裂，作为行业基本状况应该被严肃对待。但从一个似乎是积极的角度来看，“非正式”的城市建设传统有可能被重新认知分析，因为这种城市形式上的变化“弹性”和“非专业”建设所表现出来的多样复杂性，可以提供建筑学重新积累及完善自身的良好“现实”基础，甚至发现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可能性。对我们来说，这一角度至少为研究“机制”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线索和来源。一方面，有可能重新审视目前控制中国城市面貌的主要因素——政府行为和民众自发行为的基本现实，研究其产生的逻辑和“机制”特征，将它们纳入到建筑学研究中来，加深对中国城市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面对当下城市建设的强度和速度，传统建筑学表现出的“瓶颈”，是否也能够从这些“非正式”的建设手段和过程中获取有益的经验，尤其在结构组织和形态方面，以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3）“历史”问题

在今天这样一个各种后现代思潮成为主流的时代，“历史”已经是建筑与城市研究的关键词，尤其是对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国家而言。也是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多义性，使得对历史的思考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当然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中国的历史问题的思考还是多少以“西方”范式为参照的，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客观地讲，中国和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落差，这直接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在各自社会发展中的不同的阶段性需求，以及各自文化潜意识中针对具体历史现象的不同态度。这种不同，造成了中国与西方现代城市景象表面上相似，而实际结构和内涵巨大差异的现实。在上海这种非西方现代城市中，“历史”实际上承担着与西方城市（巴黎或柏林）不同的功能内涵。另一方面，“历史”在“现代化”这一巨大的人类工程中经历了价值与身份的不断变化——这是所有“现代性”问题中最为矛盾的一个——使得实际的情况往往更为复杂。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由于所谓“后殖民主义”的进程，中国这样“仍然部分地是前现代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的旋涡”的结果，使得“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日益成为它的命



● 拼贴上海



● 上海中学生制服上的城市意象
——“城市化”作为一种生活细节



运”。简言之，各种后现代思潮对中国的侵入，造成了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使后现代这个发生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结构复杂化了。这种复杂化造成对中国城市的理论思考常常处在一种集体性的“眩晕状态”，从而丧失了对迫切需要指导的实践的指导可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比较费力的，但也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必须将上海城市落实到“后殖民”这一语境中去，扭转一些西方理论对中国现实在认识和指导上的误区。这一问题是我们研究和梳理中国城市结构（如上海）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将中国城市（如上海）呈现在世界全球化平台上必须要交待的前提问题之一。

更深一步，西方现有的理论对于中国的指导普遍缺乏一个很好的转译过程，从而具体到中国的实践中，总是会有偏离。严肃地讲，相对于现有的高高在上的西方理论，中国本土的城市实践是艰苦的，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如果中间的转译不能很好解决，建筑师（无论是中国本土的还是西方的）在具体的建筑实践中，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



而建筑实践也很难真正地结合到中国当下的城市文脉中去。

二、目标

我们坚持一种“将乌托邦深化下去，完美起来”的立场。“乌托邦”的概念在中国不完全等同于其源于西方文明中的含义。这个“乌托邦”，是指中国在自身历史发展和外来压力的合力作用下所孕育的现代化理想，是一个综合性的，结合了从近代以来所有的中国社会进步的理想的总括。可以说，这是一个仍然带有一定“启蒙”色彩的现代性观念。无论从理想角度还是现实角度，这都是我们必须去做的工作。而“完美起来”，指的是逐渐完整丰富的过程，强调发展过程的“健全”，和乌托邦的最终实现与否没有必然联系。

对上海研究主要的目标或者说问题，是对其重新定位，或者说，重新定义。因为如果我们认可，单体形式风格问题、简单的美学操作并不足以成为上海建设或单体建筑成立的关键，而系统地梳理城市关系才是主要目标，那么重新解读上海的城市结构就是目前的首要研究目标。

“解读”不是“理清”。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上海在城市结构问题上到底做了哪些工作，这些工作分别是针对哪些问题做出的，现状如何。其现有的和建设中的、未建设的建筑类型，尤其是建筑组织方式，在世界建筑和城市发展历史上是否有相对应的代表意义——比如参照横向的西方典型现代城市现状和纵向的西方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诸多理想城市模型，是否浓缩了整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和特有价值。本着这样的目的，进行某种“并行”状态的阅读，为上海整理一套基于自身的空间发展历史索引，并通过分析，找到其理论上——相当一部分是西方现代城市理论——的定位，从而找到指导实践的可能。所以说，这是一个观察、理解、定位的过程。

对于上海这种“发展中”城市的特殊性，我们可能需要采用相应的